

# 嘉万年间宁波地区的碑帖鉴藏

朱 珊 刘晓峰

**内容提要** 嘉万年间，宁波地区出现了一批有着深远影响的碑帖鉴藏家，主要代表人物有丰坊、范钦、范大澈，其收藏拓本之善、规模之巨在当时颇具代表性。更有意味的是，虽然三人交往密切，但在鉴藏理念和学术视野上却存在鲜明差别，成为研究明代碑帖鉴藏的极佳案例。本文梳理了这一鉴藏群体的收藏成就、鉴藏理念以及学术影响，以期对研究明代碑帖鉴藏乃至金石学的发展提供些许参考。

**关键词** 碑帖鉴藏 宁波 丰坊 范钦 范大澈

乾隆元年(1736)，全祖望得中进士，然却以知县降用。次年，全氏辞官归里，不再复出，将毕生心血用于著书立说，最终成为阮元眼中经学、史才、词科三者兼具的一代硕儒<sup>1</sup>。全氏的藏书楼名曰“双韭山房”，位于月湖十洲之芙蓉洲<sup>2</sup>。同在此洲者，还有前朝范氏天一阁。全氏是天一阁常客，他曾有《久不登天一阁偶过有感》一诗，足见其登阁之勤<sup>3</sup>。最令其欣喜不已的，当数对范氏原藏碑帖之发现<sup>4</sup>。《天一阁碑目记》云：“《天一阁书目》所载者，只雕本写本耳。予之登是阁者最数，其架之尘封，衫袖所拂拭者多矣。独有一架，范氏子弟未尝发现，询之，乃碑也。是阁之书，明时无人过而问者。康熙初，黄先生太冲始破例登之。于是，昆山徐尚书健庵闻而来钞。其后登斯阁者，万徵君季野，又其后则冯处士南畝，而海宁陈詹士广陵纂《赋汇》亦尝求之阁中，然皆不及碑。至予，乃清而出之，其拓本皆散乱，未及装为轴，如棼丝之难理，予订之为目一通，附于其书目之后。”<sup>5</sup>从现有史料来看，这是自范钦之后，首次有人提及天一阁碑帖收藏。

〈1〉 (清)阮元：《揅经室集》上册，页544，中华书局，1993年。

〈2〉 虞浩旭：《智者之乡》页128，宁波出版社，2006年。

〈3〉 “历年二百书无恙，天下储藏独此家。为爱墨香长绕屋，只怜带草未开花。一瓶追溯风流旧，十载重惊霜鬓加。老我尚知孤竹路，谁来津逮共乘槎？”(清)全祖望著、朱铸禹集注：《鮑琦亭集·诗集》下册，页2259，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4〉 “乾隆三年戊午，先生三十四岁，侍两尊人居……重登天一阁，搜括金石旧拓，编为《天一阁碑目》，又为之记。”(清)董秉仁：《全谢山先生年谱》页12，清嘉庆九年，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5〉 前揭全祖望著、朱铸禹集注《鮑琦亭集·外篇》卷一七，页1069。

全祖望还对碑帖来源、收藏特点予以考证，特别是将范钦与丰坊的碑帖收藏进行对比，为后世了解此一鉴藏群体提供不少启发，其云<sup>1</sup>：

范侍郎之喜金石，盖亦丰氏之余风，但丰氏万卷楼石刻，有为世间所绝无者，如唐秘书贺公《章草孝经》《千文》是也，而今不可复见，惜矣！侍郎所得虽少逊，然手自题签，精细详审并记其所得之岁月，其风韵如此。且丰氏一习古篆隶之文，即欣然技痒，伪作邯郸淳辈文字以欺世。侍郎则有清鉴而无妄作，是其胜丰氏者也。

全氏从三个方面比较了范、丰二人的不同：一是收藏关系上，全氏认为范钦碑帖收藏，乃受丰坊之影响；二是收藏质量上，丰坊所收碑帖比范钦精善；三是收藏理念上，范钦以清鉴为主，精细详审，颇有风韵；丰坊则以研习书法为宗，且妄作文字，欺世钓誉。所以，全氏认为范氏所藏尽管质量不如丰氏，但在收藏理念、趣味上，却更胜一筹。那么范、丰的碑帖收藏有怎样的关联？范钦是不是受到丰坊影响？二者的鉴藏趣味是否确如全氏所论呢？

## 一 宁波地区的碑帖鉴藏群体

宋室南迁，宁波成为文人雅聚之地。其城西月湖，更是“西柳千门维画舸，华灯两岸度鸣弦”<sup>2</sup>，极尽东南繁华。至明代，宁波世家大族林立，跻身为重要科考之地。汉学家卜正民认为，嘉万年间宁波地区凭借其港口优势及科举之兴盛，业已形成了包括学者、诗人、画家、书法家、戏曲爱好者以及藏书家在内的“艺术鉴赏圈子和哲学讨论群体”<sup>3</sup>。这其中，包括了丰坊(1495—1569)<sup>4</sup>、范钦(1506—1585)、范大澈(1524—1610)。陈斐蓉曾从书画、古籍、碑帖等方面对此群体的收藏有所考证<sup>5</sup>，尤其是对丰坊碑帖收藏的内容、渠道、经济来源等问题加以关注<sup>6</sup>。然而，此一群体的碑帖鉴藏理念、碑帖鉴藏与摹刻活动之关系、碑帖鉴藏与学术著作之内在关联及其在明代碑帖鉴藏史乃至整个碑帖鉴藏史上的影响仍乏深论。

丰坊，字存礼，后改为道生，号南禺外史，宁波府鄞县人，嘉靖二年(1522)进士，授礼部主事。嘉靖三年(1523)，丰坊因随父参加“大礼仪”事件而受杖阙下，改南考功主事，谪同知通州，后罢归。归

1. 前揭全祖望著、朱铸禹集注《鲒埼亭集·外篇》卷一七，页1069。

2. (宋)罗澹：《(宝庆)四明志》卷四，《宋元浙江方志集成》第七册，页3166，杭州出版社，2009年。

3. [加拿大]卜正民(张华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士绅社会的形成》页253，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4. 李忠伟：《丰坊生卒年新考》，《赤峰学院学报》2015年第12期。

5. 陈斐蓉：《嘉靖年间宁波地区的金石书画收藏研究——以丰坊、范钦、范大澈为例》，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6. 陈斐蓉：《丰坊碑帖鉴藏研究》，薛龙春主编《历史脉络中的收藏与鉴定》页1—30，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

后，益自诞放，浸淫翰墨。晚年“童仆绝粒而逋亡，宾客过门而不入”，孤独终老<sup>13</sup>。

丰氏为月湖世家望族，全祖望曾记载：“丰氏为清敏公之裔，吾乡南宋四姓之一，而名德以丰为最……丰氏自清敏公后，代有闻人，故其聚书之多亦莫与比。”<sup>12</sup>明时，丰氏家族达到顶盛，别业遍及月湖东西，更有碧沚园<sup>13</sup>、万卷楼等藏书唱和之所。

可以说“大礼仪”事件是丰坊命运的转折点。本应翱翔金马、主盟骚坛的英才，由此沦为以鉴赏、书法自娱乃至借伪作传世的失意文人。尽管如此，其富裕的家境及自身的天赋，令他的碑帖收藏名著当时。县志中说他：“负郭田千亩，经鬻以购法书名帖。”<sup>14</sup>

范钦，字尧卿，号东明，嘉靖十一年(1532)进士，官至兵部右侍郎，嘉靖三十九年(1560)回乡归里。性喜藏书，尽购海内异本，列为四部。与吴门王凤洲家岁以书目取较，各抄所未见相易，故浙东藏书家以范氏天一阁为第一<sup>15</sup>。范氏自南宋迁至宁波，在范钦之前有功名者寥寥无几。《范氏支谱序》云：“吾族自南宋高宗朝仆射公讳宗尹由河南邓城迁于鄞，至明嘉靖十六世祖侍郎公讳钦，分居于月湖西偏，治第宅，构藏书阁，是为四明望族。”<sup>16</sup>范氏虽属望族，却不可与丰氏相提并论。由于范氏碑帖收藏发现较晚，其影响更是被其藏书所掩。钱大昕云：“四明范侍郎天一阁藏书，名重海内久矣，其藏弃碑刻尤富，顾世无知之者。”<sup>17</sup>

范大澈为范钦之侄，二人情同父子<sup>18</sup>。在鉴藏史上，范大澈以收藏书籍、古印、碑帖而知名。郑梁在《讷庵范公传》中如此描述道<sup>19</sup>：

月俸所入，辄以聚书。闻人有钞本，多方借之。长安旅中，尝雇善书者誉写，多至二三十人。尤爱法书名画，凡唐宋迄今，名公及异国人所作怪雅毕具。家藏拓本最富，一切初本、肥本、原拓、贗拓、硬黄纸、枣木版、银锭纹、李廷珪墨，过眼便悉秋毫……其收藏之丰富，鉴别之精，由此可窥一斑。

作为宁波鉴藏群体的重要成员，三人交往极为密切。丰坊与范钦为挚友，范大澈虽属晚辈，但二人

〈1〉 (明)张时彻：《芝园定集》，《四库存目丛书》集部第82册，卷43与卷46。

〈2〉 前揭全祖望著、朱铸禹集注《鮑埼亭集》下册，页2640。

〈3〉 碧沚楼原为宋代史守之藏书楼，处月湖之北，当时有“藏书之富，南楼北史”美称，明代时归丰氏。骆兆平：《书城琐记》页27-2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 (清)《康熙鄞县志》卷二二，页17，清刻本。

〈5〉 前揭李邕嗣《甬上耆旧诗》卷一七，页480。

〈6〉 (清)《鄞西范氏宗谱》不分卷，页66。

〈7〉 (清)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五，页2，清嘉庆十一年刻本，浙江图书馆藏。

〈8〉 (清)曹秉仁纂：《雍正宁波府志》卷二〇，页47，乾隆刻本。

〈9〉 (清)郑梁：《寒村诗文选·寒村见黄稿》卷一，页44，康熙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与他的交往在师友之间。

## 二 碑帖鉴藏的观念与成就

### （一）书道与传世：丰坊的碑帖鉴藏

全祖望称丰氏所藏碑帖，有世间所绝无者，这是非常可信的。除了全祖望所举碑帖外，范大澈《碑帖纪证》展示了更多收藏细节。从记载来看，丰坊曾藏有敕字本《十七帖》《庆历长沙帖》《英光堂帖》《星凤楼帖》《雪溪堂帖》。《十七帖》足称神品，《英光堂帖》全帙当时已是孤本，《雪溪堂帖》更是范大澈寻访四十年不可得之物<sup>1</sup>。《星凤楼帖》是丰坊最想获得的法帖，曾托范大澈求购<sup>2</sup>：

宋曹士冕刻，计十卷，及其精妙。余得残本只《乐毅论》数行及题跋与虞永兴《夫子庙堂碑》，真神品也。袁尚宝家有全佚归丰南禺。沈复魁云，乃渠售与。今不知所在矣。

丰坊碑帖收藏的全貌，现已无从复考，但从所举来看，其碑帖收藏之善确实几近孤绝。《丰南禺书画目》是丰坊委托范大澈求购的书画目录，其中提及的宋拓法帖多达53种。那么，丰坊收藏碑帖的目的是什么呢？概言之，一是研习书法，一是借翻刻名垂后世。

丰坊赏阅古帖之视角，或许正如他在《论法帖》中所云<sup>3</sup>：

学书，必多学古人法帖，一点一画皆记其来历，然后下笔无俗字。看帖贵博，尤不可不知。所择如《淳化阁帖》本，乃法帖之祖，其间剩有伪迹混杂，足误来学，况其他乎！《淳化》之后，如《星凤楼》《二王府》《宝晋斋》《雪溪堂》《绛州》《潭州》等刻皆好，亦必得宋拓为佳。他若《武陵》《汝州》《东书堂》《宝贤堂》等，俗恶可恶，当一切痛绝，不可滥及。

在丰坊看来，学古人法帖是书法戒俗的重要手段，而利用好这一手段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摹刻、传拓绝佳的法帖。那么，何为刻、拓双绝的碑帖呢？丰坊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列出部分代表。或者说，这是碑帖鉴赏另一层面的问题，不属于是书探讨范畴，这为后来范大澈碑帖鉴赏留下空间。

除书法外，丰坊碑帖鉴藏的另一目的是翻刻。从碑帖中求得书法技艺，仅仅是个人的喜好，而翻刻传世则意味着要将原作化身万千，惠及同好。这其中隐含着借此扩大自身声誉或留名后世的远大理想，或可从都穆致丰坊手札中窥见一斑<sup>4</sup>：

使节到苏，偶以远出，不得一面，殊为怏怏。所云《石鼓文》等因与李后主《墨竹》及他碑帖等物同典，其银颇多，一时不能取赎。明年夏间欲将《鼓文》翻刻，拓以传世，此亦存礼

1. (明)范大澈：《碑帖纪证》不分卷，页18，《四明丛书》本。

2. 陈斐蓉：《丰坊存世书迹丛考》页234，浙江大学出版社，2018年。前揭范大澈《碑帖纪证》不分卷，页15。

3. (明)丰坊：《童学书程》，崔尔平点校《明清书论集》页96，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

4. (清)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二六，鉴古书社景印本。

之志也……

据信中内容来看，丰坊向都穆借观《石鼓文》等碑帖，然而这些碑帖已被典当，准备赎回后明年翻刻。从另一视角来看，翻刻名作传世，非丰坊一人的愿望，都穆信中的口吻表明，翻刻石鼓正是他们共有的崇高理想。这并非客套，也非虚夸。要知道当时丰坊刚中进士，借此留名后世的愿望及文人内心的文化驱使应远胜于书法技艺。

丰坊虽然没有成功翻刻《石鼓文》，但其翻刻的神龙本《兰亭序》至今仍存天一阁中，翁方纲曾有诗云：“今日四明传拓出，压低三米鉴藏家。”<sup>11</sup>经其收藏、翻刻的《七观帖》，亦是破解赵孟頫、董其昌书法的重要切入点<sup>12</sup>。范大澈亦提到：“丰存叔翻刻《绝交书》，亦可宝。”《琳光楼帖》则是集古奇帖，出自著名刻工张璠之手<sup>13</sup>。

由此可见，丰坊依仗累世家产，对碑帖收藏不遗余力，并借此研习书法或翻刻传世。大礼仪事件后，丰坊了却仕途之路，习书、鉴古成为其余生所好，碑帖更成为其上接古法、借以留名的重要载体。全祖望批评丰坊“一习古篆隶之文，即欣然技痒，伪作邯郸淳辈文字以欺世”，是将碑帖收藏与其伪造古本《大学》相结合，显然有夸大之嫌。毕竟，古本《大学》有其自身的学术环境，不宜与碑帖鉴藏杂然而谈<sup>14</sup>。

## （二）清鉴与纪事：范钦的碑帖鉴藏

相较于丰坊，范钦的碑帖收藏情况更为清晰。钱大昕所编《天一阁碑目》是最能体现其全貌的著作，《碑目》录三代至宋元碑帖七百余通，不含明以后碑帖<sup>15</sup>，其数量不可谓不多。钱大昕评道：“明代好金石者，唯都、杨、郭、赵四家，较其目录，皆不及范氏之富。”<sup>16</sup>

范钦的碑帖鉴藏观念，首先需从碑与帖的角度分别考察。碑帖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使用得较早，但碑与帖本身有着重要区别。近代碑帖鉴定大家王壮弘曾从功用不同、文字内容不同、书体不同、形制不同、上石之法不同、刻法不同六个方面予以辨析<sup>17</sup>。综合来看，碑主要是为表功颂德、追述世系而立，碑文有一定的程式，书法但求庄重整齐，以书法垂于后世并非其主要目的，如果碑文为书法名家所书，往往也被学书者视为取法对象，但多数碑刻则仅被视为文献史料或者一种特殊文体。刻帖的作用则是以书法

〈1〉 丰坊刻神龙本《兰亭序》翁方纲跋，天一阁博物馆藏。

〈2〉 范景中：《从安岐说董其昌论赵孟頫》，《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6期，页74。

〈3〉 前揭范大澈《碑帖纪证》不分卷，页18。

〈4〉 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页29—49，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5〉 《碑目》实际收录804种，钱大昕序言中为720余通，范氏后人续增94种，此处以钱氏所言为记。

〈6〉 前揭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五，页2。

〈7〉 王壮弘：《碑帖鉴别常识》页8，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

传真为主要目的，以书法优劣为选择标准。范钦所藏多为碑刻，单帖不足十种，丛帖仅有《汝帖》。如此看来，范钦的收藏观念与丰坊以碑帖研习书法、借翻刻古帖传世的目的截然不同。应该说，范钦侧重于碑，更看重史料性和文学性。树碑立传在明代仍然盛行，据学者统计，范钦生前至少撰写八篇碑文<sup>41</sup>。故而，不能排除其参考所藏碑帖撰写碑文的文学目的。

范钦重史料的收藏理念，亦体现于其摹刻作品中。范钦生前曾两次摹刻帖石：一次是万历庚辰（八年，1580），摹刻丰坊的《底柱行·赠宪伯东明先生之江西》与《千字文》。《底柱行》是丰坊草书的代表作，范钦摹刻此书除纪念友人外，还有更深层的目的，其跋文云：“往嘉靖丙申间，诸大工嗣兴，余以缮部郎管内外庙宫，屯田俞郎咨伯管山陵。会侯勋、中官忠表里为奸，私冒官钱数十万，皆抑不发。勋遂诬以愆稽被逮。赖肃皇圣明，卒从薄罚，随出守袁州。贵人子方怙权，坐忤。积六年，始转九江。南禺先生赠章所为作也，第云底柱，非拟矣。迨后竟以击去荐，历危厄获保首领，非不幸已。语云，痛定思痛，愈于痛时。余何能不感怅于斯焉……”<sup>42</sup>此事在范钦仕宦生涯中有重要影响，甚至因此而获“抗武定侯者”之名<sup>43</sup>。如此，刻石便不是单纯地保留丰坊书法，而是有着很强的纪事性。可以想见后世观此刻石者，定有“证经补史”之感。

范钦第二次摹刻，在两年之后，其纪事性更为显著。此次所摹乃是丰坊旧书经文。范钦跋中云<sup>44</sup>：

友人丰考功痛子鑿殇，冀生净土，临《大士像》，书《普门品》《大悲咒》《大慧礼拜观音文》，具如叙论，志念良摧楚矣。书篆祖钟鼎，隶法钟王，出入于欧、颜、李、赵诸家，备存槩履。说者谓篆隶非考功所长，殆未睹此欤。会余孙汝枕，亦作瞽医亡，爰假此摹勒之，以志余哀，他复何论哉！嗟嗟盡矣。万历壬午阳月望，东明范钦题。

这组经文乃是丰坊为纪念其亡子丰鑿所作，而范钦摹刻也有着类似目的——纪念其孙汝枕。跋中虽对丰坊书法亦有赞赏，特别是篆隶，但“以志余哀，他复何论哉”显然表明了此次摹刻的目的所在。

丰坊和范钦都曾组织摹刻，但方式、内容、目的均不相同。丰坊选择古人法书，而范钦选择的是时人之作。丰坊的摹刻是将所藏古代精善拓本予以翻刻，而范钦尽管也有古代精拓，但却并未摹刻，而是以好友丰坊的书法摹勒上石，尽管其中有些是纯粹的书法作品（如《千字文》），但摹刻这些作品的意义更多的是对好友的纪念或宣扬。至于《底柱行》《普门品》等丰坊书法佳作，范钦的用意更在于以此纪事。

综上所述，范钦收藏碑帖的目的既不是研习书法，亦不是借翻刻善拓传世，而是将碑帖视为一种特殊史料，看重其纪事性。所以，这正可以解释其《碑目》中缘何碑刻居多，而法帖甚少。抑或说，范钦的碑帖收藏更多的是偏向宋代的金石学传统，当然，两者也并非完全相同。其组织摹刻的石刻虽形制上为

41 袁慧：《范钦评传》页117，宁波出版社，2012年。

42 （明）丰坊书、范钦摹刻：《底柱行·赠宪伯东明先生之江西》，拓本，天一阁博物馆藏。

43 前揭李邕嗣《甬上耆旧诗》卷一七，页480。

44 （明）丰坊书、范钦摹刻：《祝殇子鑿冀生净土》，拓本，天一阁博物馆藏。

法帖，目的上却是纪事，俨然是一种融合帖和碑的新形式。

### （三）鉴赏家之事：范大澈与《碑帖纪证》

范大澈《集古印谱》序中，记载着一段有趣的对话：“不佞有痰疾，每疾作，则命雪儿出种种于前，疾便退却。人欲夺，重直不售，真成蛊癖。文寿承曰：‘希奇之物，人多罕见，今遇目而又得重价，夫和吝哉？’余曰：‘此狙估射利之徒，非鉴赏家事也。’”<sup>1</sup>这段话，除了揭示范大澈的嗜古成癖之外，也引出另一个有趣的话题——鉴赏家之事。很显然，在范大澈眼里鉴赏家是一个很荣耀的身份，它与射利之徒有着严格界限。就“碑帖鉴赏家”身份而言，范大澈似乎不让古人。其《碑帖纪证》虽非专研碑帖鉴赏之作，但却隐含着一位碑帖鉴藏家的种种审视。

首先，对钩、刻之注重。当时，将墨迹转换为石刻（木刻）至少有两种方法：钩摹与影写。在范大澈看来，钩摹要好过影写。《碑帖纪证》“唐孟法师碑”条云：“张王屋（之象）木刻本不善，缘非钩摹乃影写也”，便是将摹刻效果不佳归因于不采钩摹而用影写。虽然钩勒目的多为摹刻，但往往钩勒本本身亦值得收藏，范大澈就藏有《绛州帖》《淳熙秘阁续帖》《宝晋斋帖》《玉枢经》等法帖的双钩本<sup>2</sup>。善钩摹者，亦可成为一时名家。王弘宪是范大澈极为推崇的钩摹高手，其摹刻毫发不爽、极其神妙，被推为“奇士”<sup>3</sup>。除此之外，范大澈还进一步谈及钩摹的视觉审美感受：“然京（蔡京）恣意钩摹，虽有风神而欠浑厚……丹阳孙氏刻第二、第八卷，乃文寿承钩摹，颇佳。”<sup>4</sup>“风神”“浑厚”显然不是对原书法的评价，而是对钩摹之作的视觉品评。钩摹之外，便是刻字，钩、刻紧密相连。范大澈提到，潘氏翻刻《淳化阁帖》钩既不佳，刻又不善，殊不足观；《忠义堂帖》刻亦清劲；《乐善堂帖》刻手甚佳……正如其审视“钩摹”的眼光一样，刻字是否佳善、清劲都成为其品鉴的重要元素。

其次，对纸墨、拓法之品评。《碑帖纪证》中对拓本墨色、纸张以及拓法都进行了详细品评。他在比较自藏与顾汝和藏《十七帖》时，便指出虽然二者底本相同，但顾氏所藏墨色更好。顾氏藏《澄清堂帖》《忠义堂帖》亦精妙绝伦，原因是前者为宋纸、宋墨，后者为北墨、绿纸。同样，也有因纸墨不善而让人叹息者。宋拓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明代已不可多得。范大澈仅有零叶，范钦仅有两三卷，而武陵高瑞南鸿胪有全帙，遗憾的是“纸墨不善耳”<sup>5</sup>。除了纸墨，拓法也是范大澈所关注的内容，《群玉堂帖》“余得第六卷苏东坡书，纸墨拓法甚精”；《太清楼帖》“蝉翅拓法，颇为精妙”。可见，范大澈在碑帖品鉴中较重视碑帖的纸、墨、拓法等元素，比较优劣，品评高下。

---

〈1〉（明）范大澈：《集古印谱·序》页1，明万历刻本，西泠印社藏。

〈2〉前揭范大澈《碑帖纪证》不分卷，页11—18。

〈3〉前揭范大澈《碑帖纪证》不分卷，页12。

〈4〉前揭范大澈《碑帖纪证》不分卷，页13。

〈5〉前揭范大澈《碑帖纪证》不分卷，页13。

最后，对翻刻、残本之接受。旧拓是藏家争相购藏之物，范大澈亦不例外，他对宋拓奉若至宝，但对翻刻佳者亦予以高度评价。《唐云麾将军李思训碑》“近翻刻有两种，内一种亦可观”；《淳熙秘阁帖》“丰存叔翻刻绝交书，亦可赏”，都体现了他对翻刻本的接受。范大澈碑帖收藏的另一特点，是对残本的珍视，《星凤楼帖》《宋高宗真草孝经》《琳光楼帖》等碑帖，要么为残本，要么为零叶。应该说，这种对翻刻、对残本的关注，与其偏向物质层面的碑帖鉴赏有着内在一致性。

范大澈收藏碑帖并非仅仅因其为“古物”，更因碑帖所带来的“浑厚”“清劲”“风神”的审美愉悦。然而，获得这种愉悦必须要具备足够的鉴赏知识。这种知识并非来自普通意义上的书法审美，而是源于对碑帖摹、刻、拓以及墨色、纸张的充分认知与判断。范大澈以鉴赏家自居，正是源于他对拥有这些知识的自信，而《碑帖纪证》则是其碑帖鉴赏的集中体现。

### 三 碑帖鉴藏之意义

三位碑帖鉴藏家都对碑帖有着共同的鉴藏之好，但又各有侧重，代表着不同的方向，为后世了解碑帖鉴藏的历史、演进提供了更为丰富的视野。他们在碑帖鉴藏方面的意义，具体而言可归结为两个方面：

首先，三人的收藏与著作助推了鉴藏史的发展。丰坊的《童学书程》与《书诀》背后隐含着书法实践、书学著作与碑帖鉴藏之关联，由此可见明代复古思潮背后勃郁的碑帖鉴藏之风。范大澈的《碑帖纪证》尽管内容不多，但在后世碑帖鉴藏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范钦没有专门的碑帖学术著作，但天一阁的碑帖收藏却是明清金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而言，此一鉴藏群体对书法史、碑帖鉴藏史，乃至金石学史有着一定影响。

其次，三人是传世著名碑帖的重要递藏者。传世宋拓《西岳华山庙碑》有华阴本(故宫博物院藏)、长垣本(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藏)、四明本(故宫博物院藏)以及李文田本(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其中“四明”本曾经丰坊收藏、后入范氏天一阁，乃四本之中唯一的未剪裱本，是了解此碑原貌最有力的依据。天一阁原藏宋拓《石鼓文》拓本，是清代重刻最多，影响最大，传播最广，引用最多的版本。此外，现传世的宋拓《大观帖》(故宫博物院藏)、宋拓《刘熊碑》(故宫博物院藏)以及神龙本兰亭刻石(天一阁博物馆藏)等，无不赖此鉴藏群体而永垂。

[作者单位：朱姍，天津大学、天津城建大学；  
刘晓峰，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书画器物研究所  
(责任编辑：盛 洁)]